

先 行 一 步

改 革 中 的 广 东

〔美〕傅高义著 凌可丰 丁安华译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广东人民出版社

先行一步

改革中的广东

[美] 傅高义 著 凌可丰 丁安华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傅高义(Ezra F. Vogel) 美国人, 1930年7月出生。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Wesleyan)。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精通中文和日文。自1963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从1967年至今在哈佛大学任社会学教授。曾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 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日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等, 是一位专门研究东亚国家, 特别是中国和日本的专家。他一向致力于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东亚各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 重点研究东亚国家取得成功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东亚诸国对西方社会的挑战和美国的对策。他已出版的著作可分为三个部分: (一) 关于日本: 《日本的中产阶级》(1963年); 《日本第一》(1969年)。(二) 关于美国: 《现代家庭概论》(1960年); 《重整旗鼓——重建美国的实例分析》(1985年, 该书是针对日本经济发展迅速, 在许多方面超过美国而提出的对策分析); (三) 关于中国: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 1949—1968年》(70年代, 该书向西方读者介绍从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广东的情况); 《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介绍广东的第二本书, 全面介绍了广东1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他计划若干年后再写一本关于90年代广东的续集, 特别包括1997年香港回归后粤港经济区的发展情况。他的另一近作《四个“小龙”的工业化》将于1991年内出版。

Ezra F. Vogel
14 SUMNER ROAD •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02138

委托书

我于1989年写了一本有关广东省经济改革的书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在中国先行了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省。我现委托凌司丰高级工程师将此书译成中文，以便于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Ezra F. Vogel
傅高義
1990年7月25日

出版说明

广东的10年改革（1979—1988年）过去已经两年多了，虽然我国有许多人都在致力于研究广东10年改革的各个方面，并且写了一些书和大量的论文，但是还没有人作过全面系统的论述。本社今天出版的美国傅高义著《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中文版）一书，既阐述了广东改革的动因、性质、过程，又分析了广东不同地区在改革中的不同变化与进程；从省的领导人到工厂的厂长，从国家职工到个体户，从典型人物到社会群体，都有相当细致的透视；无论是论述广东10年改革的巨大成就，还是报道广东改革的存在问题，著作者力图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作客观的评述，并没有哗众取宠，言过其实或恶意的攻击之意。当然，正如著作者在前言中所声明的，本书是写给西方人看的，要按照自己的观点来描绘，即既讲广东改革的积极的一面，也讲消极的一面。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著作者既然是一位外国学者，他的政治观点、思维方法以及遣词用语都与我们有所不同，一些观点不能完全为我们所接受，一些提法与我们的不一样，这是可以理解的。

前 言

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到以市场为主的较为开放的商品交换经济，是现代世界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如何采取更大的灵活性，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正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当前努力的方向。

1973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从1979年以来，我每年都访问广东。1980年夏季，我在中山大学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从事经济改革初期形势的研究。1987和1988年，在这方面又花了八个月的时间。本书的内容主要以在此期间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作为一个美国学者，我的目的是向西方读者介绍广东的发展情况。我力图尽可能客观地把实际情况准确地描绘出来。我知道我的观点与中国官员的观点不尽相同。他们完全不必对此负责，因为这不过是我向西方读者介绍广东发展的一项研究成果而已。我很高兴这本书能与中国人民见面。如果有人觉得我对形势的理解有错误，欢迎提出批评和意见。

本书(指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英文版，编者注)出版后，我曾于1989和1990年夏季再次访问广东。自本书脱稿以来，广东也像全国其余省份一样，一直执行紧缩政策，以控制发展过快、通货膨胀和种种不合规律的经济过热现象。在经济紧缩的影响下，广东境内的投资和一些消费品，特别是高档消费品的购买力下降了。1988年以后，除了住房以外，大城市的高楼建筑工程大量削

减了。在新的投资减少的同时，居民的储蓄额却迅速上升。而1989年以来，出口额也同时大幅度增加。对许多企业的财政计划却一直控制很紧。

1988年以后，总的经济增长率是放慢了。但广东对经济紧缩的新形势很快便适应，因此广东的许多企业能继续努力生产，继续提高其效率和生产率。广东省给中央政府的上缴金额持续显著增长。

虽然基建投资有所削减，但改革的基本政策仍在继续。当初广东享有特殊政策，并获得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机会时，曾经出现过经济迅速增长的势头。这一基本趋势在1989和1990年仍在继续。在新技术和管理技能方面，广东已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一旦紧缩政策结束，这一基础将能保证下一阶段的高速发展。

1990年7月

目 录

- 1 前言
- 1 导言 广东省的实地调查
- 13 第一部分 变革之风
- 15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灾难激发了对改革的渴望
 - 一、广东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
 - 二、1978年的起点线
 - 三、对变革的渴望
- 45 第二章 香港：外界的成就促成了改革的产生
 - 一、1950年，香港失去了内地市场
 - 二、50和60年代制造业的发展
 - 三、共同文化的出现(1967—1975年)
 - 四、一个国际城市
 - 五、广东重新对外开放
 - 六、南风吹进广东省
 - 七、新的贸易转口角色和新工人
 - 八、1997年的阴影
 - 九、双向的预先适应社会

- 83 第三章 改革的十年
- 一、给予广东和福建“特殊政策”
 - 二、广东改革的开始
 - 三、改革的成就
 - 四、机会之窗
- 135 第二部分 变革的模式
- 137 第四章 经济特区：新体制的试验
- 一、深圳经济特区
 - 二、珠海经济特区
 - 三、汕头经济特区
- 175 第五章 小珠江三角洲各县：
灵活机动的地方积极性
- 一、小珠江三角洲的重新开放
 - 二、农产品市场
 - 三、乡镇工业
 - 四、出口加工业
 - 五、城市总体现代化
 - 六、大型现代化工厂
 - 七、变革的层次
- 211 第六章 广州：老省会的重建
- 一、接待海外旅客，扩建旅游设施
 - 二、振兴广州的商业
 - 三、重建广州及其工业
 - 四、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 五、促进广州郊县的发展
- 233 第七章 地区首府：变革的前哨
 - 一、运输业和市场的扩大
 - 二、政府指导下的发展
 - 三、地区发展的七个中心
 - 四、专区首府：从农业到商业和工业
 - 五、从专区到行政地区
- 265 第八章 山区县份：向山上发展
 - 一、农村改革、分地和植树造林
 - 二、山区市场的发展
 - 三、收入的新来源及其局限
 - 四、扶贫计划(1987—1989年)
- 289 第九章 海南岛：加速发展的边陲
 - 一、1950年以前的边陲
 - 二、橡胶、垦荒和国营农场
 - 三、改革前的黎族和苗族
 - 四、建立基础设施
 - 五、海南汽车事件(1984—1985年)
 - 六、国营农场的农工、技术进步和市场
 - 七、农民和以生产为动力的市场(1983—1988年)
 - 八、早期改革影响不到之处：少数民族
 - 九、三亚旅游业
 - 十、海南省：目标宏伟、障碍重重
- 327 第三部分 变革的推动者

- 329 第十章 创业者：党政创业者、企业创业者和个体创业者
- 一、老一辈的党政创业者
 - 二、企业创业者
 - 三、小商户：受保护的个体创业者
 - 四、失败的因素
 - 五、创业性质的日趋成熟
- 357 第十一章 外贸改革
- 一、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困境
 - 二、1978—1980年的繁荣时间
 - 三、停滞和滑坡(1981—1984年)
 - 四、第二次改革之风(1985—1988年)
 - 五、广东外贸的未来展望
- 411 第四部分 变革的前景
- 413 第十二章 处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过渡社会
- 一、从细胞型社会到商品社会
 - 二、雇用形式与生活方式
 - 三、农民进城做工和基层权威的削弱
 - 四、“关系学”与不完善的动态市场
 - 五、腐化：“看门人”和缺乏耐心的消费者
 - 六、对未来指导方针的建议
- 445 第十三章 广东—香港地区的起飞
- 一、日本、台湾和南朝鲜的起飞

- 二、广东起飞的特点
- 三、粤港地区的出现
- 四、广东改革的影响超越国界
- 五、先行一大步

471 附录

481 译后记

导 言

广东省的实地调查

1973年，当我初次访问广东省时，即使是对参观者开放的工厂，也是机器陈旧，维护不善，常因忽视安全措施或设备、材料和能源供应不足而停工。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工人也提不起工作兴趣。自1967年以后，大学就没有正常开课。在省会广州，运载货物多半使用冒烟的柴油拖拉机和人力三轮车。国产的大型货车既运货又载人，人们就站在后面敞开的车厢内。市内公共汽车很少，小汽车几乎没有。许多商店已不营业，销售的商品量少、质差。肉菜市场既小又冷清。到处看不到任何建设工程。在样板人民公社平洲，只有几间小工厂。包括农机修配厂在内，大部分都用手工操作。农村的货物多半用柴油拖拉机、牛车和肩挑运输。道路不平，有些连自行车也难以通行。人们害怕被别人看到自己与外国人接触，更不用说与之坦率交谈了。

1979年和1980年我再度访问广东，发现变化不大。1978年农村人均收入仅为193元，稍高于100美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也只有402元。1980年全省农业人口仍然占80%。

然而，自1980年以后，我年年访问广东，每次都感受到显著的变化。到1987年，广州的人力三轮车已绝迹，柴油拖拉机也禁

止入城了。公共汽车已很普遍，货车也极少载客了。除自行车之外，街道上的出租汽车、面包车、小汽车和摩托车络绎不绝。街道上商店林立，货源充足，顾客盈门。露天食品市场宽敞、喧闹，出售的食品种类比以前增多。到处可见新的大厦和建筑工地。数十间工厂已有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平洲公社所在地已扩建成一座小城镇，拥有许多大型新工厂、一座现代化宾馆和许多公寓楼房。公社到处是一片热闹繁荣的景象。农村里铺筑了许多道路。全省每个农户平均拥有的自行车数量，从1978年的0.55辆增加到1986年的1.39辆。在农村的公路上，货车和面包车已大量代替了柴油拖拉机。到1987年，农村人均年收入已增加了两倍多，达到64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平均增长率为11%。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已提高到1233元。多数人乐意公开谈论自己的生活 and 议论自己的政府。

在毛泽东逝世两年后，邓小平开始推行改革。1978年12月，他制订了沿海地区发展新战略，以推动经济发展。上述这些变化，正是推行新战略所产生的结果。在这之前，为了平衡资源，减少外强觊觎和袭击的危险，毛泽东从沿海地区调拨资源去建设内地较穷的省份，代价往往很大，却收效甚微。邓小平决定允许沿海地区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试行新制度，使之变成推动中国其余地区发展的动力机。在沿海诸省份中，广东省具有独特的优势。它位于远离北京的最南部，海岸线长达2400公里。用它作试验，不必担心因政治或经济的混乱对首都带来威胁。因为在重工业和国家财政收入方面，广东所占比例不大，危及国民经济的风险很小。由于毗邻香港，广东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最方便之路，又最有条件试验有用的外国技术和管理方法。因此，中国允许广东带头试验，正如口号所提的：先行一步。

广东开始发展的时期，正是苏联及东欧诸国考虑改革之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到，在使人民致富的目标上，它们已经落后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开始考虑变革，包括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甚至包括共产党领导的模式。中国的前总书记赵紫阳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会议上，以外交辞令宣称，社会主义国家并非进行改革竞赛，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推行改革。但在实际上，中国在戈尔巴乔夫开始其改造的几年前就已开始经济改革，并且比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更为深入。而在中国内部，广东省的改革又比其他任何省份搞得更活。如果说，广东的改革在中国是先行一步，那么对于社会主义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也许就是先行两步了。

广东是一个亚热带省份，在改革前其面积相当于一个主要欧洲国家，达21.200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6000万。广东的对外贸易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长期以来就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前哨。当1699年英国在广州建立常驻贸易机构以后，广州就是外国“对华贸易”的中心。自1760年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广州又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直到1949年，广州一直是中西方交往的中心。

广东人比其他省的人有更多的出国机会，并带回更多的西方方式，深感外界国富兵强，爱国志士奋起迎接西方的挑战。鸦片战争便是在一批抗英志士的发动下，在广东打响的。1898年发动改革清王朝(1644—1911年)的维新运动领导人梁启超和康有为都是广东人。1911年民主革命领导人孙逸仙的祖籍也在广东。他还在广州建立了国民政府。蒋介石曾任广州郊区的黄埔军校校长，并依靠该校的毕业生才建立了其早期权力基础。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其革命生涯，并在那里构思出农民革命。

但是，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的精神中心并非在广东或其他沿海地区，而是在中国内地。中国从1949年以后便对资本主义世界关上了大门，专心致志对内，不再需要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共产党领导人对广东沿用同样的政治结构，同样的政策，搞同样的运动，与对其他省份没有两样。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中国不仅把新的经济投资着重放在内地，而且在政治上也变得内向和排外了。过于西化和资本主义化的人或有海外关系的人均受到怀疑，人人但求自保。没有一个省份比广东更适合于作为批判的靶子，也没有一个省份比广东更彻底地为中国的闭关政策所扭曲。

1978年开始的改革使广东恢复了其历史的作用，那就是迎接西方的挑战，使国家富强。然而，历史的背景却完全变了。中国此时已是一个独立强国，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广东不再需要扮演抵御外强的角色，而是要在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中领先。这种新的背景还包括提高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力和在科技与教育方面达到高水平。虽然广东对扮演这一角色已有历史基础，但70年代的重新开放对整个体制的冲击，并不亚于1949年关门时的震动。习惯于执行毛泽东主义的领导人，这时不得不研究西方的管理和技术，搞政治斗争的人加入了为工业效率而斗争的行列。还有那些一直谴责资本主义的人，现在也反过来向曾经被他们谴责过的人学习。这种转变绝不会是轻而易举的和皆大欢喜的，因为并非所有的西方模式都能被人们认可。广东的作用之一，就是从众多的外国经验中筛选出有用的东西。

广东的领导人意识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但在毫无经验的新的复杂情况下，他们中许多人害怕会犯错误。他们的目标是将一个教育落后、贫穷而封闭的省份带入现代世界之林。改革的头10年生气勃勃，但也出现混乱，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都发

生很大的变化。

1987年我应广东省政府的邀请，用七个月的时间对自改革开始以来广东各方面的进展进行研究和报道。接待我的单位是负责全省经济发展的经济委员会。我被告知，我和我的妻子是首次获此邀请的外宾，也是被邀请长期下榻在广东迎宾馆内唯一的两位外国人。我尚未听说过，还有哪位外国人得到类似机会专门研究一个中国的省份。

广东的官员要进行这样一项研究有几方面的用意。他们知道，广东的外国投资环境并不尽如人意。但他们相信，广东省的成就和开放程度远远超过多数外国人的了解。如果广东的近况能够得到客观的报道，将会有助于改善外资的投资环境，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其机会和前景。省领导人意识到，如果由官方自己宣传，效果容易被打折扣，而一个外国学者的报道将会更加令人信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想寻求一种既适合中国传统，又符合世界现实的社会透视。所以，他们乐于接受一位对有关国家和地区有较多经验的局外人的透视。

从我同省级领导人的谈话中，我相信我之所以受邀请前来广东，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由于我是对广东各方面发展作过专门研究的外国学者。中国官员只有极少数人会讲英语，而我能阅读中文资料，也能用普通话进行采访。这样，与我共事就省事得多。有几位省级官员读过我的早期著作《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有人看过原文，或看过内部发行的翻译版本。他们对书中的观点未必全部都同意，但承认这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由此他们了解到，我熟悉他们的组织结构、政策，以及广东的城市和县份。他们也知道，当1980年夏季改革刚刚起步时，我在中山大学逗留了三个月，这